

先父焦易堂追随 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段经历

焦宗岭 焦维和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先父焦易堂长期追随的革命领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先父珍藏的两册文献付诸发表，并根据先父生前的口述，对有关这些文献的一段历史作些说明。

这两份文献，主要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孙中山先生给先父焦易堂的五封信和通过父亲给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护法议员的两封信。这些信件反映了在南方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孙中山先生对推动革命继续发展的深谋远虑；记述了孙中山先生对北方革命斗争、护法斗争及国会斗争的英明决策和正确主张。

一九二一年，孙总理率师北伐，先父奉孙总理之命以参议身份随行，师至桂林，陈炯明把持的广东政权断绝了大本营后方的粮饷，使孙总理困驻桂林数月。孙总理回到广州训诫陈炯明，陈叛变，总统府被焚，孙总理蒙难，出驻“永丰”军舰。父亲说，当时城中混战，飞弹如雨，他到处寻觅孙总理，在乱军中才从陈少白同志处打听到孙总理的去处。父亲匍伏在东堤数小时，几近遇难。战间小息，才租赁到小船，前往白鹅潭谒孙总理。总理在军舰上数夜未安眠，父亲见到他时，孙总理眼球布满红丝，面带紫色，杨虎同志持枪侍侧。父亲请示行动计划，孙总理说：南方革

命一时不易集事，北方人情尚厚，嘱父亲先返北方，在北方宣传三民主义，广泛组织同志，以为再起之准备。并说如果北方革命军有基础，他也有往北方之意。父亲到北方后，即赅资印总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讲演稿二十余万册，散发于北方军、政、学各界。

一九二三年，孙总理于广州受各军推戴任大元帅职，我父亦随往。孙总理考虑到国会在北京开会时，其他党派的议员易受北方军阀的影响以致以合法地位压迫革命，因此指示国民党议员入京监视，并委任谢持及先父在国会中组织党团。不久后，谢南下，党团事改由先父、王用宾等主持，先父在北京头发胡同六号组织了民党议员通讯处，以便商议政事，诸如如何同不良分子斗争，如何控制国会免遭利用等。同时，又在头发胡同九号组织民党俱乐部，广泛结交和团结各界人士，京中青年学子来加盟者数百人，扩大了国民党的影响。

在此期间，曹锟图谋贿选总统，以我父为首的民党议员极力反对。曹锟为了拉拢国民党的力量，曾通过冯某约我父及王用宾至保定游览。到保定后，曹派参谋长陆锦示意我父，愿以重金高爵相约，换取支持，遭到父亲拒绝。父亲返京后，针锋相对，约反对贿选议员二百余人赴津南下。

父亲是一九一二年担任国会议员的。从那以后，他多半时间住在北京，对北方军政活动情况比较清楚。他经常奉孙总理指示，往来于京、津、沪、粤之间，从事革命的秘密工作，并被孙总理委任为北方军事特派员。一九一八年，他奉总理命赴天津同景梅九、续西峰、杨仁天、冯钦哉、刘觉民等设秘密机关，我父负责北方同志与总理的通讯使命。我父还常与弓富魁、樊醒民、胡景翼、曹俊夫等武装同志计议，促使陕西革命军不断壮大。一九二

○年间，父亲考虑北伐一时不易成功，与国会议员谢良牧商议，拟将北洋系势力分化，联段祺瑞以击曹锟，议定后密禀总理，表示拟以国会议员身分进行此事，事成则党受其益，事败愿承受其谤。取得孙总理同意后，他到天津见段祺瑞，密言：“民党与北方势力对峙，非国家之福。如能接受三民主义，与民党合作，民党不愿与你争军政大权。”段祺瑞应允，并先后派光云锦、徐树铮衔命南下，谒孙总理面商合作事宜。段祺瑞虽无诚意，但北方直皖两系由此生隙，而有直皖之战。

一九二三年前后，我父在天津，明与段祺瑞往来，暗中却同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岳维峻、刘守中等人计议武装革命。为利于从事这些活动，孙总理委派我父为陕西、河南军事特派员。

一九二四年，在孙总理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父亲参加会议后即返北方，协助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进行首都革命，推翻了曹锟贿选政府，然后又代表国民军南下，迎孙总理北上。总理虽重病在身，仍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直至病逝。

孙中山先生生前因我父能认真执行国策，对父亲倚畀甚殷，关怀备至。他曾写道：“易堂焦君，秦中杰士也。为国事奔走有年，于民国创造颇有功焉。其为人也，端直温厚，不类近世子。”^①我的大哥焦步骥，青年时即随父从事革命武装斗争，民国七年在陕西以身殉国，受到孙总理的亲切唁慰^②。父亲在北方从事的革命活

^① 引自《国父全集》第四集：“焦心通先生暨崔太君行状书后。”（民国七年三月）

^② 见《国父全集》第三集：“复广州焦易堂，唁慰其子殉国并告拟以私人名义赴欧美函。”（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动，也深得孙总理的赞赏。孙总理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给我父的信中就有“经画西北，具见周详，毅力热诚，殊堪嘉尚”等语。青年时期即参加辛亥革命斗争的父亲，对孙总理的学说、伟大事业和伟大人格都极为崇敬。总理在北京重病期间，父亲躬身在北京侍疾。总理逝世后，父亲悲痛万分，参与了(第三组)守灵、护灵工作。一九二九年又参加了赴北京迎总理灵柩至南京中山陵安葬的典礼。

出于对孙总理的崇敬和怀念，父亲在总理安葬后，痛定思痛，产生了整理“总理遗教”手迹的想法，兼之这时他已在南京任职，结束了到处奔波、多年从事革命秘密工作的戎马生涯。他将总理的手迹裱糊成册，不时捧读，并用以作为教育后代的墨宝。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